



天津记忆第二十二种

主编 王振良

记忆的碎片

津沽文化研究的杂述与琐思

王振良 著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古籍出版社

問津文庫

天津记忆第二十二种
主编 王振良

记忆的碎片

津沽文化研究的杂述与琐思

者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记忆的碎片:津沽文化研究的杂述与琐思/王振良
著. — 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 2016.12

(天津记忆/王振良主编)

ISBN 978-7-5528-0455-3

I. ①记… II. ①王… III. ①文化史—研究—天津
IV. ①K292.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77127号

记忆的碎片:津沽文化研究的杂述与琐思

王振良 著

出版人/张玮

*

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西康路35号 邮政编码:300051)

<http://www.tjabc.net>

今晚报社印刷厂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880×1230毫米 1/32 印张9 字数196千字

2016年12月第1版 2016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28-0455-3

定 价:38.00元

综汇群芳开盛业

张元卿

世人谈论天津，恒以“文化沙漠”视之，有人对此颇感不平，这就是我的朋友王振良。他首先觉得“文化沙漠”话虽偏颇，“我津学人，固亦难辞其咎”，进而呼吁天津学人应行动起来，重新对天津历史文化进行梳理与评估。可十年前，振良在天津还听不到什么回声。于是，他决定自己先行动起来，终于在2008年创办内部交流的民间学术资料《天津记忆》，与友人自掏腰包印行，终于使这个俗称“小白本”的所谓民刊，成了天津文史研究者必读的抢手货，至今已出版一百余期，默默地改变了天津的学术生态。而在不经意间，围绕“小白本”以及后来的《问津》，又形成了一支以研究天津历史文化为中心的民间学术队伍。这本《记忆的碎片：津沽文化研究的杂述与琐思》，收录了振良编辑《天津记忆》时所写的各类编后记（也有极少数是序言），这些“碎片”不仅是他与来自学院和民间的作者进行学术对话，进而参与其学术研究的工作记录，也是民间学人逐步走到一起成为“学派”的历史记录。

振良办《天津记忆》的宗旨,就是要重新对天津历史文化进行梳理与评估,但天津历史文化涉及面很大,如何去梳理,怎么去评估呢?从《天津记忆》所呈现的学术格局和学术特色看,我觉得振良的总体思路大致是这样的:一、研究天津文史必须整合学院研究者和民间学人,这样才能使天津的学术力量形成合力,而他尤其看重民间学人的学术成果与学术潜力;二、具体研究要聚焦特定的历史时段,在历史发展脉络上统合资料,体现历史的纵深性、多样性和不确定性;三、评估历史文化,必须要从完善和挖掘史料入手,史料不足,必须继续累积史料,不能随便下结论;四、文献研究要尽量与田野调查相结合,每期《天津记忆》都尽量做成一个专题。他特别重视田野调查,希望通过切实的调研成果来拓展城市史研究的领域,也关注挖掘民间史料的学人,及时推出他们的研究成果,保存濒临消失的文化血脉。这样,《天津记忆》最鲜明的特色,就是及时催生和推出了一批民间学术成果。

在《最后的南市》编后记中振良写道:“今年(2009年)元旦,按例上早班。午后骑车至和平路老九章,与老穆相约见面,打算看看残存的最后南市。我们顺着荣业大街穿越而过,到处都是废墟和瓦砾,著名的天下第一楼、天津午报社、同福楼饭庄等,都已经踪迹难寻。”面对废墟,他们“随便拍了几张片子”,“老穆步行,我推着自行车,一起逃离南市”。然而他们并不甘心就这样逃离,他们最终觉得应为南市做个“临终纪念”。这样,振良就和张建说想编本《最后的南市》,问他有没有兴趣。张建觉得振良的建议可行,立即行动起来,便有了用照片记录的“最后的南市”。振良在编后记中特别指出:“拍过南市的摄影家,可能为数甚夥,但精心记录每幅照片拍摄位置的,肯定屈指可计,而这恰恰是这些照片的最大价值所在:百

十年后，当我们重读这些陈年旧影的时候，看到的绝不是简单的‘南市街景’，而是一处处具体可触的南市肌体，以及由此带给人们的沉重的反思。”

在《走近铃铛阁》编后记中他这样写道：“本集开篇所访问的范贵林先生，今年5月初飘然仙去，享年105岁。笔者因考察马家店（王襄确认甲骨文之地）的关系，曾两次采访老人，在此谨表示深切的悼念。随着城市旧有居住格局的迅速打破，以及这些见证历史的老人相继离世，针对某个社区的口述历史资料采集，已经变得越来越困难。关于这类资料抢救之重要，早已成为多方的共识。但问题之关键却是，共识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而更应付诸于行动。这一点，张建先生的《走近铃铛阁》，无疑再次给我们树立了样板，一个非常优秀的样板。”要重新认识和评估城市街区的历史价值，不能空谈理念和设想，关键在行动，赶紧抢救值得重新认识的东西，把他们做成系统的文献，边整理，边研究，才有可能准确重估其价值。而这一切的基础是行动！在与城市历史街区改造拆迁抢时间的学术抢救行动中，学院派研究者似乎并没有强烈地意识到随着老街区消失的是不可恢复的城市文化载体，即便他们意识到这载体要消失，也觉得这载体的有无和他们的科研项目并无关系，因此没有必要出手，事实证明他们对于身处其中的街区变化很大程度上是冷漠的。因此，在编后记中振良特别强调了抢救与行动的意义。

此后，更多的民间学人加入到了抢救的队伍中。

在《陈家沟杂谭》编后记中振良写道：“从城市社区或者聚落的角度，进行口述资料的采集、整理与研究，目前也有了很好的开端。在《天津记忆》序列里，我们曾经编印过张建的《‘老南市’忆往》《口述堤头》，在这几本集子里，汇聚了作者对近百位常住居民的采访

记录。如今,一默先生的《陈家沟杂谭》又将付梓,这无疑天津城市社区历史研究中的又一可喜收获。”“张建的‘口述’与一默的‘杂谭’,可谓是殊途同归。说他们‘殊途’,主要有两点不同:一是调查研究对象有别。张建所关注的,是活着的或者正在消亡(拆迁)的历史街区,就是说至少在采访过程中,这一历史街区还是现实的存在;而一默所面对的,则是已经完全灭失的历史上的社区,其原住居民早已星散各处,目前还能大体圈定的,只有它的四至范围。二是成果表现形式各异。张建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居民原生态的口述资料(有些说法可能是错误的,但却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历史真实),并详为记录采访对象、时间和地点等,其成果具有社会学上的统计分析意义;一默则在大量口述资料采集的基础上,查找参考历史文献,对相关内容进行归纳、整合和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创作、绘制出《陈家沟子地理买卖杂字》和《陈家沟子地理买卖图》,对已经消亡的历史街区,在时间上和空间上进行了科学的复原。说他们‘同归’,是因为张建与一默的研究,都取径于社会学的调查方法,通过对原住居民口述资料的整理或加工,以留存城市历史街区的原始风情风貌,为今后相关研究的深入奠定了基础。”最后他又写道:“张建和一默,在天津城市社区口述史的研究中,都迈出了开拓性的步伐。现在,张建又把镜头和笔触投向了‘被遗忘的西沽’,我们也希望作为陈家沟‘小孩儿’的一默先生,凭借着他对这块土地的深深挚爱,进行更加深入的开掘与探寻,写出更为完善的《陈家沟子小志》来。”

张建和一默的抢救实践,与振良的理论总结配合得真是天衣无缝。这种经过实践验证的理论,在天津民间学人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最后的“永久黄”》印行时,其间展示的绝大部分历史遗存,今已不复存在。振良在“代序”中深情地写道:“随着天津碱厂的搬迁和旧厂区的拆除,作为整体的‘永久黄’已经消失了。存留下来的老库房、石灰窑、科学厅以及黄海学社等,只是些零星破碎的符号,已无法全面承载‘化工摇篮’的昔日历史。这本记录天津碱厂旧厂区彻底拆除前‘永久黄’遗存的小册子,让我们看到的是这一‘摇篮’的最后影像。唱挽歌是无奈的,但我们毕竟还有这些歌声!”

《大直沽琐记》编后记保留下这样一个故事:“这位突然造访的长者,就是这本小册子的作者梁广中先生。大约10点半钟,我匆忙打车赶到单位,见到了这位虽头发花白,但精神矍铄的老人。当他将亲手编绘的《大直沽官前繁华图》徐徐展开时,我的眼前顿时一亮。该图聚焦于1950年前后的大直沽官前地区,对商铺、摊点、住户等注记甚详,史学和社会学价值很高。这种图简单明了,形象直观,可以说是复员历史现场最好的办法之一。我惊讶于作者的精细,当即表示愿将其连同配套文字一起,编入《天津记忆》之中。”梁广中先生做了振良想做但没时间做的事情,因此他非常理解梁先生大直沽研究的价值:“历史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要尽可能复原历史现场。但作为史学家们,乐于投入时间和精力,多是较为重大的历史课题,对于城市社区这种转瞬即逝的民间的(并非不重要)、琐碎的(绝对不虚妄)、浅显的(但是不浮泛)生活记录,往往容易视而不见。而恰恰是这些史学家们不想做、不愿作或不屑做的事情,给了民间研究者和爱好者以广阔的生存空间和表现舞台。这些民间化的研究可能浅近,可能粗糙,也可能不尽规范和科学,但这却是来自实地调查梳理的第一手的资料,鲜灵灵的,活生生的,其生命力并不弱于高头讲章乃至长篇大论。甚至几十年上百年过

去,被历史汰去的不是前者而是后者。”

《天津记忆》系列中,最引人注目的除了以上这些研究城市历史社区史的作品,还有一些创造性地解读地方文献的作品。王勇则兄对《徐天瑞日记》的购买、整理和解读过程,就是一个经典案例。振良在《一九四九年一月之天津——解读徐天瑞日记》编后记中写道:“我们并不缺乏有学问的专家学者,但是我们缺乏肯下笨工夫的专家学者。民间史料的价值,主要即在于发现,而这种‘发现’恰恰需要些笨工夫。如果没有勇则宵旰夜寐的阅读,《徐天瑞日记》不过是徐天瑞的日记;但我们幸喜有了勇则的阅读和发现,《徐天瑞日记》则变成研究天津解放难得的社会史、军事史资料,它不但真切反映了天津解放前后一位年轻知识分子的微妙心路历程,而且真实再现了天津解放前夕广大人民群众的苦难生存境况。尤为可贵的是,勇则还从日记里读出了天津解放过程中,敌我双方进行的宣传战、心理战等内容,给天津战役史的研究提出了一个全新课题,由此更可以看出勇则的史家眼光。普通的学生徐天瑞,有意无意中写出了一本并不普通的日记,今天我们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解读它,作为一种个案可以说都是极其难得的。”《解读徐天瑞日记》后来有了正式出版机会,但有关审稿人员对日记的真实性提出质疑,勇则兄由此又开始寻找徐天瑞的后人,几经曲折最后终于与徐天瑞之子取得联系,证明日记不但非是伪造,而且还有一册姊妹篇(1948年日记)。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凡发明之业,往往出于偶然。发明者或并不能言其所以然,或言之而非其真,及其发明之结果公之于世,多数人用各种方法向各方面研究之,然后偶然之事实,变为必然之法则。”勇则兄对《徐天瑞日记》的解读,就是梁启超所说的“发明之业”,现在它已充实为《津门开岁:徐天

瑞日记解读》，由天津古籍出版社正式推出，我相信随着“发明之结果公之于世”，勇则兄对当日“偶然之事实”之解读法，定会成为此类研究中必然之通则。

在此处强调民间学术成果，并不是说民间学术成果无可挑剔，而正如振良所说，民间学术在研究的系统性、规范性和叙述的严密性、准确性等方面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而之所以强调民间学术成果的价值，是因为民间成果多是靠个人兴趣完成，除了术业“专攻”得来不易，其成果或有独特的视角，或有补白的作用，或能及时抓住契合当下的课题，或能挖掘被历史尘封的文献，也是当代学术研究的重要成果，应与优秀的学院研究成果互相辉映，而不应任其自生自灭，或被人为地有意无意遮蔽。《天津记忆》关注民间学术成果，却并不漠视学院研究者的存在及其取得的成绩，《天津记忆》所刊学院研究者的专业著述也不是一般民间学人所能胜任。事实上，振良办《天津记忆》是“两手都硬”，一边关注民间学人的研究状态，及时推介他们的研究成果，一边与学院研究者保持畅通的联系，积极推动学院研究者把体制内不认可的且无法搞好的研究，用业余时间做出来，及时在《天津记忆》上刊出，让民间学人和有相近学术志向的学院研究者及时看到他们“不务正业”的成果。因此，振良说《天津记忆》是个“敞开的圈子”，“这个‘圈子’是完全开放的，它以推动天津历史文化挖掘、研究、保护、弘扬为根本宗旨。这个圈子的作者不分性别、年龄、地位、职业，既接受专业著述，也不拒草根文章，只要您在天津历史文化研究上有专长、有心得、有兴趣，我们都在所欢迎”。

百余期《天津记忆》，搭建的是学院研究者和民间学人自由交流的平台，在这里学院研究者看到他们想做能做但没有做成的研

究在民间学人手中开花结果,会受到“刺激”,看到他们没想到的做不成的研究在民间学人手中“横空出世”,会受到启发和鼓舞;而民间学人在学院研究者“不务正业”的成果中,会发现学院中并不乏具有“民间情怀”的研究者,而深有同道知己之感,也会对学院派的小课题研究所呈现的系统性和规范性有真切的了解,进而产生见贤思齐之感。因此,百余期《天津记忆》的历史贡献,不只是推出了一批有价值的学术成果,更在于它为天津文史研究者搭建了交流平台。在这个平台上,一些学院研究者通过民间学人的成果照见了自己“民间性”,由此开始通过重拾“民间性”重建自己的学术品格;一些民间学人则通过学院研究者的专业著述验证了自己身上的“学院性”因子,并由此开始真诚地吸收学院派研究的长处,以提升自己的学术品质。事实证明,《天津记忆》真正的知音和作者多是具有民间情怀的学院研究者和尊重学院研究的民间学人。其中,民间学人随着《天津记忆》的发展而成长,逐渐形成《天津记忆》学人群。从2013年开始,振良又开始创编另一本内部交流的民间学术资料《问津》,随后又与天津古籍出版社合作推出大型天津历史文化丛书“问津文库”,《天津记忆》学人群便自然地转化为《问津》和“问津文库”的主要作者,同时也成为“问津”学人群的基本班底。他们通过自己的实践,经由《天津记忆》和《问津》,辟出了一条研究天津历史文化的新路,一个研究天津历史文化的民间学术流派,在这个学人群与学院派的良性互动中逐渐成型。这个学派的研究对象是天津历史文化,有独立的学问体系,研究方法多由田野调查而出,研究队伍相对完整,重要研究成果会收录在“问津文库”,这在当下的地域文化研究中可以说是独树一帜,我愿将这个学术流派拟称为“问津学派”。准此,这本《记忆的碎片》文字看似随意、芜杂

与散乱,但所展示的却是振良个人研究天津历史文化的思考、卓识与抱负,同时也是一部“问津学派”的成长简史。

“问津学派”是在天津这块土地上自己生长出来的,他们不空谈思想与学问,而是将思想内蕴于叙述与考证之中——人在当下,却不为当下的研究风气所左右;学在过去,却不为过去的僵化保守所桎梏。他们坚守稳健务实的治学原则,是当代学术史上少见的能激活地域文化血脉的学术力量;他们虽不入某些“精英”之“法眼”,却在自己的学术田野上,在更多平凡学人中得到了响应;他们还“用各种方法向各方面研究之”,使得“问津学派”这一群体的平凡作业,渐将链接累积为旷世之盛业。

这无疑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学术传奇。

2016年4月3至4日作于南京南秀村,5日改定

编 例

一、本书收录 2008 年至 2013 年我为《天津记忆》撰写的序跋类文字,虽属杂凑成书,但均属有感而发,或有一言可采者。

一、撰文时心态以及环境各异,故行文或文或白大有不同,这里尽皆保留原初面貌,只改正了十数处错字和不规范的用字。

一、数字用法适应篇章特点和叙述语气,当初意旨各有所归,因此未据国家出版物标准统一调整,均各仍其旧以切合主题。

一、半数以上篇章其时径以“编后记”之类题名,这次增拟标题并加*号标识,虽未必恰切,但约略可作七零八碎的导览。

一、各篇落款或曰杜鱼或署本名,均为印行时原貌;时间作农历者,与其他需补充事项均以“鱼按”形式在文末详细注明。

一、本书正文字数略啬,乃掇录部分私人日录,以“纪事”名目补缀在每篇最后,算是当初胡涂乱抹的背景,有删而无改。

一、全部文字别为五类,曰故籍翻新,曰耆老鸿踪,曰师友随谈,曰析津旧迹,曰闲言碎语,然并不科学,聊取大略而已。

一、另有关涉《天津记忆》之创办以及年刊、周刊、半月刊的文字若干，今作为附录置于最后，约略可觐其间的联系所在。

2016年11月20日

目 录

序言:综汇群芳开盛业 / 张元卿	001
------------------------	-----

编例	001
----------	-----

故籍翻新

一生悲苦话王樾 *	
——《双清书屋吟草》整理说明	003

八里台的当年风雅 *	
——《城南诗社集》整理前言	006

文情雅趣展重阳 *	
——《城南诗社集》编后记	009

“奇赏共欣”钟韵长 *	
——《蟬香馆诗钟》整理前言	011

啮余残纸剩蟬香 *	
——《蟬香馆别记》整理前言	014

说“良心话”的人 *

- 《〈中华画报〉白羽佚文》前言 016

李琴湘之骈词偶语 *

- 《择庐楹联录》整理说明 020

“两个家族”的纸上印记 *

- 《延古堂李氏族谱》编后记 023

珍视民间史料的发掘

- 《一九四九年一月之天津——解读徐天瑞日记》编后记 ... 027

嗣响流芳在津门 *

- 《七二钟声》编后记 030

“不以诗鸣”的郭霭春 *

- 《残吟剩草笺补》编后记 033

打开历史真实大门的管钥

- 《鸦片战争与天津史料编年》编后记 036

耆老鸿踪

纷纭众口话严公 *

- “严范孙先生诞辰 150 周年纪念号”编后记 041

说不尽的王氏家族

- 《王仁安与王君直》前言 044

作为文艺家的李金藻 *

- 《金声琴韵录》编后记 047

文字的生命力 *

- 《刘云若逝世甲子纪念集》编后闲弹 050

小说家里多面手 *

- 《白羽研究专号》编后缀语 052

发现阎道生

- 《阅庐艺文记》代序 054

楚材晋用 *

- 《王度庐百年诞辰纪念号》编后闲言 057

也是“三步走”*

- 《怀念郭霭春》编后 059

“抉求考存”纪前贤 *

- 《霭春先生文存》编后记 063

勿忘关永吉

- 《勿忘关永吉》前言 065

追忆“活字典”*

- 《张仲纪念专号》前言 068

一点说明

- 《穿月斋社会历史学辑稿》编后 070

“仰止”与“瞻望”

- 《瞻望穿月斋》编后记 073

“周汝昌说”和“说周汝昌”*

- “周汝昌文化论坛专号”编后 075

遼谷书香

- 《遼谷书香》卷首 080

“避而远之”与“接而近之”*

- “来新夏教授米寿庆祝专号”编后 084

天津的来新夏

- 《九秩骏庵》编后记 087